

附件 2

巴中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结项申请书

立 项 编 号

项 目 类 别	一般课题
1. 基础理论	1. 1. 基础理论
2. 应用研究	2. 1. 应用研究
3. 技术开发	3. 1. 技术开发
4. 社会服务	4. 1. 社会服务
5. 交叉学科	5. 1. 交叉学科
6. 其他	6. 1. 其他

项 目 名 称 巴中“四龕”文化价值阐释与开发利用研究

项目负责人 荀洁

所 在 单 位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填 表 日 期 2025 年 6 月 6 日

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制

2025 年 3 月

声 明

本研究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享有推广应用本成果的权力，但保留作者的署名权。特此声明。

成果是否涉及敏感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是□ 否☒

成果是否涉密： 是□ 否☒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适用于巴中市社科年度规划项目、专项项目等结项申请。

二、认真如实填写表内栏目，凡选择性栏目请在选项上打“√”。课题申报信息无变更情况的可不填写《项目变更情况数据表》。

三、本《结项申请书》报送2份（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并附最终成果打印稿（正文格式要求：主标题2号方正小标宋简体，其中一级标题3号方正黑体-GBK，二级标题3号方正楷体-GBK，三级标题3号方正仿宋-GBK加粗，正文3号方正仿宋-GBK）。

四、所有结项材料须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县（区）申报者报送所在县（区）社科联审核后统一报送至市社科联，其他申报者可直接报送市社科联。

一、项目变更情况数据表

立项项目名称											
结项成果名称											
是否变更		A、是		B、否		变更的内容					
原计划成果形式						现成果形式					
原计划完成时间						实际完成时间					
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变更情况											
原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所在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现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所在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原参与人员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联系电话				
	余芹				助教						
	何婷				助教						
	杨茜				助教						
	康慧萍				助教						
现参与人员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联系电话				

二、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审核事项:1. 成果有无政治导向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2. 最终结果的内容质量是否符合预期研究目标。）

该成果无政治导向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最终结果的内容质量符合预期研究目标，同意报送。

签 章
年 月 日

三、县（区）社科联意见

（审核事项:1. 成果有无意识形态问题；2. 是否同意结项。）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四、专家鉴定意见

(请在对应意见栏划“√”)

1. 成果有无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有 ☐ 否 ☐

2. 是否同意结项: 是 ☐ 否 ☐

3. 鉴定等级: 优秀 ☐ 良好 ☐ 合格 ☐

主审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五、市社科联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巴中“四龕”文化价值阐释与开发利用研究

苟洁

摘要：巴中“四龕”（南龕、北龕、西龕、东龕）是巴蜀地区重要的佛教石窟群，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艺术等多重价值。本文首先概述巴中“四龕”的基本情况；接着从历史见证价值，揭示其反映的宗教传播与社会变迁；自然生态价值，体现石窟与环境的和谐共生；科学技术价值，展现古代开凿与建筑技艺；艺术美学价值，呈现精湛雕刻与彩绘艺术；社会文化价值，反映民俗信仰与地域文化等方面，深入阐释其文化价值。最后，基于巴中“四龕”现状，从保护传承优先、数字科技赋能、文化旅游共生、区域共建共享四个维度，探索其开发与利用路径，旨在为巴中“四龕”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推动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关键词：巴中；四龕福城；文化价值；开发利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5 年度巴中市社科规划课题“巴中‘四龕’文化价值阐释与开发利用研究”研究成果。

1. 巴中“四龕”的概况

石窟作为重要的佛教遗迹，是研究佛教艺术、佛教史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关键实物资料。巴中被誉为“中国石刻之乡”，对研究中国石窟文化也有

着重要地位。巴中石窟，实则继承了北方石窟造像的“龕”，多为开凿于崖壁之上的浅龕，未有“窟”的深度，实为“摩崖龕像”。目前发现全市有石窟 225 处、1200 余龕、造像 14000 余尊，这些造像多镌刻于隋唐时期，被盛赞为“盛唐彩雕、全国第一”，尤其是围绕巴城的“一城四龕”“四龕福城”的奇特人文景观和山水格局更是全国唯一^[1]。

南龕石窟位于巴中市城南郊南龕山上，1988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巴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摩崖龕像，这些龕像于隋唐开凿，据原巴中县文管所工作人员 1980 年代的调查登记及编号，共有 176 个龕窟、大小 2700 余尊造像，如蜂巢一样的石龕分布于崖壁之上，石窟中鬼斧神工的造像五颜六色、造型各异、栩栩如生，极具视觉冲击力。南龕石窟在巴中石窟中也是极具特色的，开凿于开元年间（713—741 年）双头瑞佛，是全国唯一的高浮雕石刻双头瑞佛。雕刻于天宝十年（751 年）的陀罗尼经幢，是川渝地区雕刻时间最早的陀罗尼经幢。南龕的地藏与六道像、六臂如意轮观音像、有俗装胁侍的毗沙门天王造像都是巴中唯一，而且巴中最大的石窟菩提瑞像也在南龕。



图 1 巴中南龕石窟

北龕石窟地处巴中市城北的苏山南麓，坐北朝南。始凿于隋，兴盛于唐，现存造像 34 龕、348 尊，2001 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巴中石窟和“一城四龕”重要组成部分。北龕石窟主要题材有药师佛观音地藏并立、弥勒、释迦老君并坐等，雕刻精细，线条柔和，玲珑多彩。特别是浅浮雕刻的飞天形象生动，伎乐天所持各种民族乐器神态逼真，再现了佛教艺术的魅力和高超的技法，是巴中石窟的精品佳作。北龕石窟的十二药叉大将护卫场面在巴中石窟中也是不多见，丰富了巴中石窟造像内容，是研究巴中乃至整个四川地区佛教石窟这一题材内容相关问题的重要窟龕，北龕石窟造像是巴中石窟中初唐、盛唐时期的代表，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图2 北龕石窟 浅浮雕刻



图3 北龕石窟 药师经变龕

西龕石窟位于巴中市以西的西华山西龕村，造像始凿于隋代，多为唐代作品，现存 91 龕，尊像 2118 尊，主要分布于佛爷湾、流杯池、龙日寺三个区域，是巴中石窟现存龕像中开凿最早的一处。200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爷湾位于西华山脚下，现存龕像集中分布于南北向的一崖面上，共 50 余龕，内容有释迦佛、弥勒佛、菩提瑞像、七佛、释迦多宝并坐、释迦弥勒并坐、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观音菩萨、释迦老君并坐及墓塔和残碑刻等^[2]。流杯池坐落于西华山山腰处，现存两座残损龕窟以及若干残碑、墓塔等遗迹。其中，53 号龕的龕柱上精雕有高浮雕的亭台楼阁，这些唐代仿木构建筑遗存堪称古代艺术珍品。两座仿木楼阁高达 2 米，共分三层，其方形台阶与转角斗拱的镂空雕刻，充分彰显了古代匠人的高超技艺。楼阁之上，供养菩萨、供养天人及伎乐天形象栩栩如生，伎乐天所持乐器为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两座建筑造型独特，实为难得的唐代建筑标本，备受建筑学家瞩目。

而位于山顶的龙日寺，现存 30 余龕造像，多凿于初盛唐时期，造像内容涵盖释迦、菩提瑞像、七佛、千佛观音以及菩提瑞像与弥勒佛并坐像等。



图 4 西龕石窟 53 号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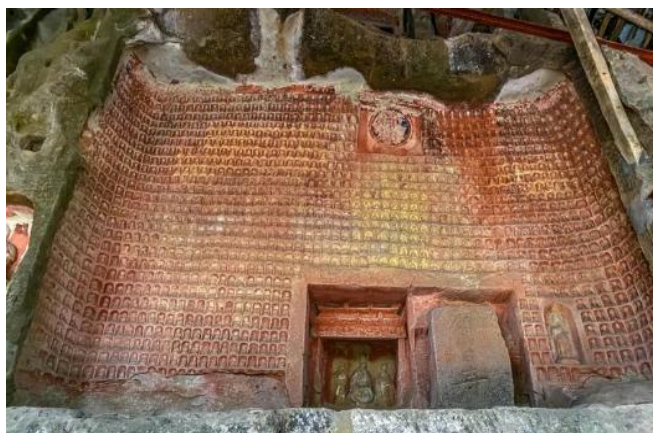


图 5 西龕石窟 龙日寺千佛

东龕石窟据《巴州县志》记载：东龕位于城东 1.5 公里的佛尔岩。《巴州志》载：《志稿》云，插旗山在州东五里，一峰突起，顶锐而有小台，名义无考。山下亦有佛龕，或以为东龕。但因岁月变迁，年久失修，保护不当，东龕石窟已湮没在岁月中，不复存在。而水宁寺石窟位于巴城之东，人们便以水宁寺石窟取代了当年的老东龕。水宁寺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水宁寺镇。现存龕窟 39 龕，造像 316 尊，分布于环绕水宁镇的水宁村水宁寺、千佛崖、佛龕村、二郎山等处。造像时代为隋唐，主要题材有药师三尊并立、释迦弥勒并坐像、释迦说法、观音善财龙女等。其中最为精彩且保存相对完好的是第 1-9 龕。此九龕均凿于盛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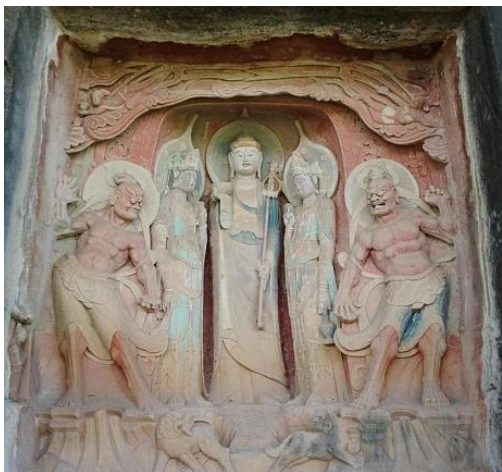


图6 水宁寺石窟 1号龕



图7 水宁寺石窟 2号龕

2. 巴中“四龕”文化价值阐释

2.1 历史见证价值

巴中在隋唐时期属山南西道，是国家政治中心沿着米仓道向南传播文化的一个必经线路，也是盛极一时的一个区域交通节点。巴中石窟作为川渝地区四大石窟群之一，“四龕”开凿史自隋唐延续至明清，其造像题材如菩提瑞像、双头瑞像等与唐代长安佛教艺术存在直接关联，印证了盛唐时期佛教艺术通过米仓古道从中原向巴蜀地区传播的历史路径。着米仓道的日益繁荣，官道、兵道与商道在此交汇融合，无形之中强化了唐代巴中与中原、关中地区的紧密联系。在此过程中，石窟艺术等多元文化不断传入巴中，并在此地实现了交流与融合。这恰好解释了为何巴中石窟多分布于米仓道沿线的交通要冲、驿站以及因米仓道走向而兴起的古城、古镇等人口密集区域。巴中石窟的兴起，还与战争背景密切相关。唐代安史之乱、唐与吐

蕃及南诏的战争，以及黄巢起义后，唐王朝为避战乱，选择放弃金牛道而改走米仓道，前往经济富饶且具有天然军事屏障的巴蜀地区避难。彼时，随唐玄宗、唐僖宗入蜀的皇族、官吏、商贾、文人、画师及高僧等，将中原文化与佛教艺术带入巴中，极大地推动了巴中石窟造像艺术的繁荣。唐僖宗入蜀途经巴中时，还引入了一些佛像样式。而随玄宗入蜀的官员严武，在被贬为巴州刺史后，短短数年间便在巴州南龕主持雕塑了观世音像，新建了龙宫，构筑了寺宇，并为南龕求得了御赐之名——光福寺。唐中和四年（884年），随唐僖宗入蜀的尚书右丞张祜，亦曾在巴中南龕造像，并在题记中详细记载了他“追随圣驾”入蜀的行程及修造释迦佛像的经过。是以环绕巴城主城区的“一城四龕”格局既是佛教信仰的物化表达，亦暗含“护城”的军事防御功能。

巴中在隋代全国崇敬佛教的形势下开始有了摩崖造像，到唐代武则天推动的全国崇佛时期造像达到高峰。武周时期开始，由于唐与吐蕃之战火，入川之主要通道从经由广元之金牛道渐渐转移至经由巴中的米仓道，天宝以后基本改走米仓道，在这一特殊阶段，广元交通地位渐渐衰退，巴中突显，因此开元以后，直到唐末，这里造像不衰。巴中石窟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佛教本土化过程中的技艺创新，更折射出巴中作为唐代西南边疆与中央政权文化互动的桥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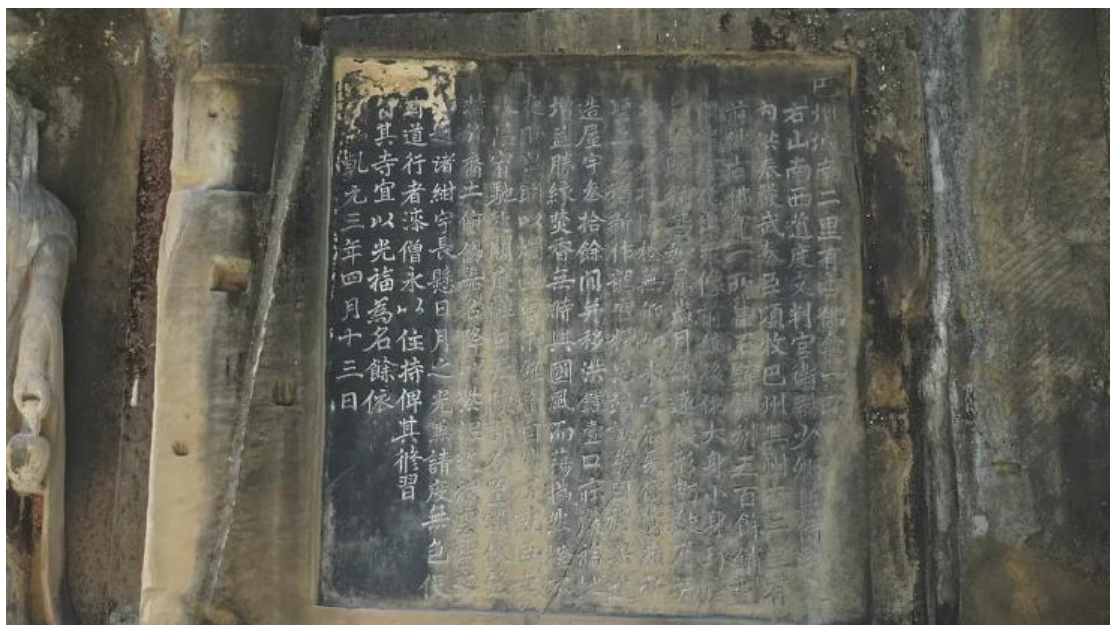


图9 南龕 严武奏表碑

2.2 自然生态价值

巴中“一城四龕”表达了大巴山古朴的天人合一生态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巴中四龕石窟的千年营建史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南龕石窟作为四龕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造像群，选址于巴城南的南龕山腰，依托天然崖壁形态走向，巧妙利用山体褶皱与植被分布，形成“石窟藏于山”的和谐布局。此后北龕、西龕、东龕相继开凿时，不仅延续了因地制宜的营造智慧，更注重四龕之间的空间呼应——北龕借巴河支流自然分隔，与南龕形成轴线对称；西龕依山势高低错落，既独立成景又与主龕群遥相辉映；东龕则在崖面肌理处理上刻意保留原始地貌特征，使四龕整体呈现出“山作佛龕”的天人合一之境。

巴中“四龕”的生态基底源于巴中独特的山水格局。近年来，为保护石窟生态环境，巴中市实施巴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南龕山森林公园，通过水土保持与植被恢复，使石窟群所在的崖壁与周边苍松翠柏，形成共生系统。如今南龕山间古木参天，崖壁苔藓与千年造像共同构成动态生长的文化景观，既延续了古人“以自然为佛殿”的营造智慧，更通过生态治理实现了石窟遗产与山水林田的永续共生。这种“山即佛国”的景观体系，既是对《华严经》“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当代诠释，也是巴中“四龕”自然生态价值的创新表达。当游客穿行于山径，既能感受唐代彩绘造像的艺术震撼，又可目睹巴河鹭鸟掠过崖壁的自然画卷，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典范。



图9 绿树掩映的南龕石窟景区

2.3 科学技术价值

巴中“四龕”呈现出石窟选址的理性考量与造像艺术的卓越智慧。作为川北地区佛教石窟的典型代表，巴中“四龕”文化景观是山地石窟选址与营造的典范。造窟者基于对巴中地域环境的深刻认知，在复杂的地形地貌中巧妙利用自然条件，将石窟艺术与山地景观有机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选址智慧与造像技艺体系。

从选址科学性来看，巴中“四龕”的营造充分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策略。在地理区位上，四龕均分布于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的巴河沿岸，既便于取水与交通，又依托山体形成天然屏障，满足宗教活动与安全防护的双重需求；在地质条件上，造窟者选择砂岩与泥岩互层的山体，既保证了开凿的可行性，又通过分层开窟的方式规避了山体稳定性风险；在朝向设计上，龕窟多面向东南或正南，充分利用自然采光，既符合佛教“向阳而建”，又通过光影效果强化了造像的立体感；在空间布局上，龕窟群依山势呈阶梯状分布，形成“上龕观景、中龕礼佛、下龕休憩”的功能分区，体现了对山地空间的立体化利用。这种因地制宜的选址智慧，为当代山地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造像技艺的智慧性方面，巴中“四龕”展现了隋唐代工

匠对材料特性与艺术表达的深刻理解。在雕刻技法上，工匠针对砂岩质地疏松的特点，采用“减地平钹”与“高浮雕”结合的手法，既保证了造像的立体感，又避免了因过度雕刻导致的结构破坏。如南龕第 116 号龕的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像，主尊衣纹流畅如行云流水，胁侍菩萨的璎珞雕刻则以浅浮雕表现层次，体现了对材料性能的精准把握；在空间营造上，通过龕窟形制的创新设计增强宗教氛围。西龕第 53 号窟以仿木构的斗拱与鸱吻装饰塔身，将建筑语言与宗教符号融为一体，既强化了龕窟的空间纵深感，又隐喻了佛教“须弥山”的宇宙观；在细节处理上，工匠通过“以形写神”的雕刻理念，以极简的刀法传递丰富的精神内涵。如水宁寺第 1 号龕的“药师佛立像”，面部仅以数刀勾勒慈悲神态，衣褶却通过疏密有致的线条表现出动态美感，体现了“以少胜多”的艺术智慧。



图 10 龕第 116 号龕 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像

2.4 艺术美学价值

巴中“四龕”作为隋唐佛教艺术的典范，其美学价值不仅在于精湛技艺，更在于构建了多维审美体系，体现了宗教信仰、地域文化与艺术创造的深度融合。

从空间美学看，巴中“四龕”选址布局彰显“天人合一”哲学。石龕依山开凿，龕窟与崖壁虚实相生，光影流动间营造出“步移景异”的视觉体验，将自然地貌转化为艺术载体，展现唐代石窟艺术的空间智慧。

造像艺术层面，巴中“四龕”造像呈现“三性统一”特征。世俗性方面，菩萨立像丰腴体态与含蓄微笑，将宗教神圣性与人间烟火气相融；地域性上，飞天飘带纹饰与唐代画像砖一脉相承，彰显巴蜀文化基因；创新性维度，造像突破程式化表达，展现唐代工匠的空间处理与形式创新能力。

龕窟题记作为艺术载体，兼具书法美学与宗教叙事价值。南龕的唐代巴州刺史严武《奏请巴州南龕寺题名表》碑楷书端庄灵动，遒劲中见变化，融北碑雄浑与南帖秀逸于一体，堪称唐代“破体书”典范。北龕唐代供养人题记则通过身份信息记载，构建起跨越时空的信仰共同体，使文字成为承载信仰的物质载体。

巴中“四龕”更通过空间叙事构建多层次审美体验。南龕“千佛崖”密集龕窟与通道设计，引导信众完成从世俗到神圣

的空间转换，与唐代寺院布局理念呼应，形成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空间。龕窟内彩绘残迹与自然风化肌理，共同构成时间沉淀的审美维度，使观者在艺术之美中感受历史沧桑。

巴中“四龕”的艺术美学价值，既体现在精湛技艺与独特风格中，更在于其通过空间、符号与物质载体构建的完整审美体系。这种将宗教情感、地域文化与艺术创造深度融合的创作范式，既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承，也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转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图 11 南龕 双头瑞佛



图 12 南龕释迦牟尼佛

2.5 社会文化价值

巴中“四龕”其社会文化价值在经济、文化、情感三重维度上均呈现出显著特征，成为川东北地区文化传承与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

经济价值维度。巴中“四龕”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文化影响力已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巴中市文旅融合发展的核

心引擎。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视，“四龕”的旅游吸引力持续增强。2025年“五一”假期，巴中市石窟景区迎来旅游热潮。据统计，全市石窟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6万人次，门票收入与文创产品开发（如复刻题记拓片、石窟主题文创饰品）直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同时，“四龕”旅游辐射效应显著，拉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业发展，形成以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产业链。

文化价值维度。巴中“四龕”的文化价值体现于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双重积淀。物质层面，南龕石窟的唐代造像群与水宁寺龕的“释迦多宝并坐”像，堪称唐代佛教雕塑艺术的典范，其衣纹处理、空间布局为研究唐代建筑与雕塑技法提供了实物例证。北龕的唐代供养人题记与南龕严武《奏请巴州南龕寺题名表》碑，则以书法艺术与历史文献的双重属性，成为研究唐代社会制度与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非物质层面，“四龕”所承载的“巴蜀佛教文化圈”特质，通过造像风格的地域性表达（如飞天飘带的螺旋纹饰）与题记中的方言词汇，展现了唐代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融合现象。此外，巴中“四龕”作为唐代佛教传播路径的实物见证，为研究佛教中国化进程提供了关键节点。

情感价值维度。巴中“四龕”在地方民众情感认同中占据核心地位。作为国家级旅游景区，“四龕”不仅是巴中市的文

化地标,更是当地居民精神归属的象征。南龕石窟的“千佛崖”与西龕的“药师佛龕”,长期作为民间祈福场所,承载着民众对健康、平安的朴素愿望。水宁寺龕的唐代供养人题记中,普通信众的姓名与祈愿文字,使“四龕”成为跨越时空的集体记忆载体。此外,“四龕”作为川东北地区重要的研学基地,通过定期举办的佛教艺术讲座、石窟保护体验活动,增强了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成为文化传承的情感纽带。

综上所述,巴中“四龕”的社会文化价值不仅体现于其作为文化遗产的经济转化能力,更在于其作为文化符号与情感载体的深层意义。在经济、文化、情感三重维度的交织中,“四龕”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地方与全国的文化枢纽,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提供了生动实践。



图 13 南龕石窟游人如织

3. 巴中“四龕”开发利用探索

3.1 保护传承优先

强化研究阐释，筑牢保护传承的理论根基。以巴中“四龕”的学术研究为着力点，聚焦深化对其各类价值的认知与阐释。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开展巴中“四龕”及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专题调研，全面掌握其保存现状、管理状况、保护措施、展示效果以及利用程度等实际情况。基于调研结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专项保护规划与修复设计方案，确保保护工作科学、有序推进。立足巴中“四龕”资源现状以及社会公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需求，制定推动文旅产业与教育、科技等领域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与实施路径^[3]。通过整合各方资源，促进巴中“四龕”在文化传播、旅游开发、教育普及以及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为“四龕”的传承保护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加强对古籍文献、档案资料中关于巴中“四龕”的记载、拓片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专项整理工作。系统梳理“四龕”所蕴含的佛教文化、雕刻艺术、书法艺术等方面的精华，形成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巴中“四龕”与巴中地域文化、民俗风情以及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挖掘其在当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为“四龕”的传承保护与文化复兴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与智力支持。

着眼融合发展，完善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各相关政府部

门、单位应进一步强化文物保护意识，切实履行职责，勇于担当作为，始终将巴中“四龕”的保护工作置于首位。切实强化各级政府在“四龕”保护与利用工作中的主体职责，确保各项活动均依法依规有序推进。应主动将“四龕”资源融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及城乡建设布局之中，加大对“四龕”在保护管理、学术研究、阐释传播以及展示利用等方面的资源投入，促进“四龕”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协同共进。秉持深化改革理念与系统思维方法，有效整合文物、文化、旅游等多领域的专业人才资源，统筹推进巴中“四龕”的学术研究、保护修复与传承利用工作。同时，积极动员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文化爱好者及志愿者等社会各界力量，围绕“四龕”的传承保护与利用开展常态化交流与合作，致力于构建一支专业能力强、社会参与度高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此外，还需建立健全由文化和旅游、公安、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安全监管与执法机制，确保巴中“四龕”的保护利用工作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开展。通过推进文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巴中“四龕”的优先传承保护提供坚实有力的体制支撑。

3.2 数字科技赋能

巴中“四龕”历经千年风化、人为破坏及自然侵蚀，其保护与传承面临严峻挑战。数字科技的介入为这一文化遗产的活

化利用提供了新范式，可以通过构建“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场景应用”的闭环体系，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动态平衡。三维建模与病害监测。基于激光扫描与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巴中已建成“四龕”石窟 3D 建模数据库，实现毫米级精度还原。例如，南龕石窟双头瑞佛的数字化复原，不仅保留了双头瑞佛高浮雕的细节特征，还通过热成像技术监测到壁面微裂缝的扩展趋势。结合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风速、岩体位移等环境参数，为病害预警提供数据支撑。虚拟现实与沉浸体验。依托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开发了线上虚拟游览平台。游客可通过 270 度环幕剧场，沉浸式体验盛唐石窟开凿场景，甚至“触摸”石龕的飞天衣袂，增强了公众的文化感知。大数据与文化阐释。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 15 幅题记、79 通碑碣进行语义分析，挖掘出“四龕”与米仓古道文化传播的关联性。例如，西龕第 21 号龕的“大业五年题记”与敦煌文献的互证，揭示了巴中石窟在南北佛教艺术交流中的枢纽地位。同时，通过知识图谱构建“四龕”人物、事件、技艺的关联网络，为学术研究提供可视化工具。

目前，巴中“四龕”数字赋上能仍面临技术适配性不足（如岩体微变形监测精度待提升）、数据孤岛（多部门数据未共享）、公众参与度低（线上平台用户活跃度不足）等问题。未来需加强跨学科协作，推动“数字孪生”技术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

并探索“政府+企业+公众”的协同治理模式。

3.3 文化旅游共生

文化赋能，以“四龕”为核心构建全域旅游格局。巴中“四龕”作为全国唯一的“一城四龕”石窟群，其文化价值与旅游开发具有天然共生性。南龕石窟的盛唐彩雕、北龕药师经变相、西龕三重天宫楼阁、水宁寺龕的地藏菩萨像等艺术瑰宝，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库。以“天下米仓·四龕福城”城市文旅IP为统领，可构建“石窟+古道+古镇”三位一体的文化旅游轴线。例如，将南龕石窟与米仓古道光雾山段、恩阳古镇串联，形成“盛唐气象—古道沧桑—巴人遗韵”主题游径，使游客在体验佛教艺术的同时，感受蜀道交通文化与巴人生活方式的交融。通过数字技术复原唐宋时期开凿场景，开发AR导览系统，让游客在现实与虚拟的交互中深化文化认知。

空间整合，造“四区一圈一园”文旅功能矩阵。针对“四龕”分布分散的现状，需通过空间规划实现资源聚合。南龕片区可建设文化体验传承核心区，依托现有石窟艺术博物馆，增设隋唐佛教造像临摹工坊、石窟保护技术展示中心；北龕片区打造非遗乡旅体验区，结合悬挑穿斗式传统建筑窟檐，开发石刻技艺研学课程；西龕片区建设石窟主题公园，利用生态修复后的林盘资源，植入禅意民宿、禅茶体验等业态；水宁寺片区联动周边农业资源，发展“石窟+农旅”融合项目。各功能区通

过环城绿廊串联，形成差异化发展的文旅集群。试点数字文创商圈，利用 3D 打印技术复刻经典造像，开发文创衍生品，实现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的转化。

机制创新，构建“保护—利用—反哺”良性循环。建立“政府主导、专家智库、企业运营、社区参与”的共生机制。政府层面出台《巴中市石窟保护条例》，设立专项保护基金，实施“四窟”保护工程；引入敦煌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智库资源，开展“四龕”微环境监测与病害治理研究；培育本地文旅企业，参与景区运营，如开发“石窟温泉”等特色产品；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石窟解说、非遗表演等工作，形成利益共享机制。数据显示，2024 年国庆假期南龕石窟接待游客 1.4 万人次，门票收入同比增长 107.8%，验证了共生模式的可行性。未来需进一步优化门票联动政策，推动“四龕”与光雾山、诺水河等景区形成跨区域旅游环线，实现客源互导与资源共享。

3.4 区域共建共享

巴中“四龕”与广元、达州等地的石窟寺、历史遗迹同属蜀道文化带，具有天然的地缘与文化关联性。通过系统梳理各地资源，可构建以“石窟艺术—历史名人—民俗文化”为主线的蜀道文化旅游资源谱系，为联合开发提供基础支撑。

线路设计，打造多元主题的蜀道文化旅游环线。基于资源整合成果，可设计多条主题旅游线路。比如：“石窟艺术探秘

线”，串联巴中“四龕”、广元千佛崖与皇泽寺、达州真佛山石刻，游客可沿途领略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石窟艺术魅力，感受佛教文化在蜀道的传播与演变。“历史名人追寻线”，以巴中晏阳初故里、广元李白蜀道诗篇遗迹、达州元稹纪念馆为节点，通过历史场景复原、诗词朗诵会等形式，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蜀道上的文人风骨。“民俗文化体验线”，结合巴中翻山饺子舞、广元女儿节、达州元九登高节等非遗项目，开发民俗主题研学产品，增强游客的文化参与感。各线路间通过交通接驳、门票联动等方式实现无缝衔接，形成“一环多支”的旅游网络。

合作机制，建立跨区域协同发展平台。为保障蜀道文化旅游线路的可持续发展，需构建跨区域合作机制。成立由巴中、广元、达州三地政府主导的“蜀道文化旅游联盟”，制定统一的旅游服务标准与质量监管体系，避免恶性竞争。设立专项合作基金，用于旅游基础设施共建、联合营销推广、文化遗产保护等项目。例如，联合打造“蜀道智慧旅游平台”，整合三地景区票务、住宿、餐饮等信息，提供一站式服务；共同策划“蜀道文化旅游节”，通过石窟艺术论坛、非遗展演、徒步挑战赛等活动，提升线路的品牌影响力。同时，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蜀道文化研究，为旅游开发提供学术支撑，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良性互动。

4. 结语

巴中“四龕”作为全国罕见的城市石窟群，其开发与利用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命题，更是推动区域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从历史维度看，“四龕”见证了佛教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传播与本土化进程，其隋唐至明清的造像序列完整呈现了中国石窟艺术的演变脉络，为研究宗教传播、社会变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从空间维度看，“四龕”与米仓古道、巴河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揭示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规律，其独特的山水城格局为城市规划与生态保护提供了历史范式；从价值维度看，“四龕”所承载的唐代彩雕技艺、宋代建筑信息、明清民俗造像等多元文化要素，不仅构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动注脚，更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当前，巴中通过“四龕护城”文旅品牌建设，已初步形成“保护—利用—反哺”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实现石窟微环境监测与病害治理，通过窟檐建设、遗址公园规划等工程提升保护水平；另一方面，以“一核多点”的旅游格局串联“四龕”资源，开发研学课程、文创产品等衍生业态，近两年的旅游业增长印证了文化赋能经济的可行性。未来，需进一步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广元、达州等地构建蜀道文化旅游共同体，同时强化社区参与机制，让文化遗产真正成为惠及民生的文化资本。唯有如此，方能实现“四龕”从历史遗产向城市

名片的跨越，让千年石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吴江.兴起：龕从何处来？[N].巴中日报.2024.10.22

[2]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D]. 四川大学博士论文 .2005.04.10

[3]邓庆猛;赵蓓蓓.孟子故里邹城摩崖石刻文化遗产价值及保护利用策略
探析[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04.15